

# 战争叙事的虚与实

——《火光在前》阅读札记 □张志强

刘白羽与出身于军队的众多作家有所不同,他是少有的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作家,他是生在大运河畔的北京之子。他带着淳朴的信念走向部队,又在战争中实现自我,他的作品有小说、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在军旅文学中具有重要地位。

1949年10月25日的《人民文学》创刊号上,发表了刘白羽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小说写的是渡江作战,是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中的故事,小说将浪漫情怀与紧张的战争进程融合在一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文坛引起很多关注,作家本人也成为这一时代军事文学创作领域的明星。

《火光在前》用11章的篇幅来描写解放军的渡江作战,讲述的是解放军某部一个师横渡长江,追击国民党军队,克服巨大的自然困难,突破身体极限,最终突破国民党军队长江西线防线并南下追剿残敌的英雄故事。小说创作于解放战争的现场,高亢的叙事语言、欢快的节奏,让小说显得跳跃而鲜活。小说的焦点是描写以这支部队为代表的解放军大军响应“全国进军的命令”“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积极进取的壮志豪情,表现了人民解放军的大无畏精神。

这篇小说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描写的是行军,而非打仗。小说虽然写的是与国民党军队的作战,部队紧紧追逐也是国民党军队,可是,作品中我们很难见到国民党军队,乃至个体的国民党军人都罕见。小说中的人物:师长陈英才、政委梁宾、秦得贵、李春合、一科长雷英、二科长柴浩、游击队长魏金、东北战士王春、南方战士杨天豹等等,他们的所有行为都是在赶路,都是克服种种困难、突破阻碍前进的过程,因此,这是一部带着浓重战争味道的行走小说。

恰恰因为作品没有直接写战场、写战斗,却真实地反映了作者的忠诚,刘白羽的文学关注点是在于新闻性、真实性,这是刘白羽小说的一个特点。刘白羽是战争的亲历者,作为随军记者,他参与了这场战争的行程,原本的目的不过是想记录下战争的过程,写下那些感动天地的战争中的事和人事,他明确地告诉我们:“我在开国之初,从南下作战的硝烟如火、泥泞暴雨归来,那种鲜明的生活跃跃在目,就无法控制,一挥而就,写了中篇小说《火光在前》,我并未立意要歌颂第一个10月1日,无意中在结尾处却响起了新世纪的洪亮钟声。”他的注意力是战争事件,也就是他要记录并且站在阶级的立场上来说明这场战争的性质,至于结果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刘白羽下意识用了两个办法来完成小说的

阐释功能,即书写的浪漫性和事件的完整性。战地浪漫的描写,不仅可以舒缓战争本质上的残忍性,更可以减少阅读与回顾时的那种痛感,用浪漫的情怀、高亢的语调转移人们对于战争残酷性的感受。浪漫指的当然不是浪漫的爱情,而是指部队的乐观向上的进军姿态,这关系到对这支部队形象的认知和对部队行为正义性的理解。

此外,小说表现出了对于集体荣耀和集体行为的重视,它描写的焦点在于整支部队的整体行动,而不是个体在战争中的突出行为。小说所描写的部队的任务就是去追赶并且消灭那些在前方的国民党部队。所以,小说充满了行动性,充满了战场的现实感。部队的行走与暂歇都是在执行追击和歼灭任务。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小说写的是战场、战争、行军、打仗,却很少描写到刀枪相对、敌我相向,小说的核心是行军,而不是打仗。小说的描写集中在我方的拼命行走和看不见的敌人的玩命逃跑。因此,我们看到的作品的绝大部分是我军如何克服自然带给我们的困境和我们自身的牺牲与顽强。

小说的语言昂扬高亢,叙事声音里充满着斗志,连受伤死亡都有着积极的充满着希望的声音。小说中描写的最高职务是师长,而后是团级干部、连级干部和战士们。这是一支完成渡江任务的主力作战部队,他们通过艰苦的努力渡过长江,而且经过死伤无数的南方山地终于达到战争目的。叙事声音的高亢与高调压制住了战争本身的残忍性,使用宏大而又乐观的语句让一切都显得那么轻松光明。

小说是虚构的,注重的是人物与情节,而新闻却是写实的,注重的是对事件完整性的记述与对过程的描写,这两种文体有着较大的区别。刘白羽是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火光在前》是他以新闻记者的眼光去看待渡江作战,不能完全像写新闻那样写一篇过程的报道,也不能完全以小说方式虚构这场战争的进程。刘白羽正是身处现场,又要以虚构的方式呈现,这样的创作是相当具有难度的。

小说给予我们的启发是多方面的,如果给这篇小说从体裁上准确定位的话,照我看,称其为“新闻小说”恐怕最恰当不过了。小说是以人为主,以事为辅,也就是说,在小说里是因为人物要走路,所以才有了路;而不是因为有了路,所以才有了人物。无论是新闻还是小说,作品的主题性却是首先要考虑的。刘白羽在谈到《火光在前》的创作时说:“《火光在前》是我长久以来在战争生活中,不断感受、不断酝酿着的诗……普罗米修斯盗火使人间有了火;



我们现实中的英雄,却是从人间消除那灾难的火,而升起胜利的火焰。于是在南渡长江的战斗行进中,一个早晨,我确定了《火光在前》这部小说的主题。”(《政治委员》前记)而这个主题具有鲜明的政治化,或者说是新闻化的主题,他关注的是事件与事件背后的哲学、道德价值。之所以要写这篇小说,其目的并不完全是因为这场战争中的人物感动并攫取了作者的灵魂,而是这场战争所引发的革命的、乐观的、有着光明未来的事件促使作家深陷其中,他要表现的恰恰是“时代的精神”,这也是解放战争中最需要解释并且以现实的方式阐明的主题。

恰如刘白羽在完成这篇作品之后的感叹:“这个战斗集体改变了我,影响了我的世界,道德标准,美的原则……以至我的性格。反正火药与战尘是不会白白从我们心上吹过去的,阶级兄弟的生命又怎能不在我们心灵中投下种子。”(《关于〈火光在前〉的一点回忆》)这个认识有着切身的体悟感,他在小说中完成了自己与那个时代需要迫切弄清的问题:为谁而战?为什么要战?因为正在进行着的解放战争其本质是内战,是一场刚刚结束了与外族侵略不相同的内部之战。这与渴望和平、渴望回归田园生活的中国人的梦想是相悖相反的,作家在作品中自觉地承担起了阐释问题与解答战争疑惑的责任。

塑造英雄形象的重要主体。作家需要下基层、下田野,成为像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一样的人,深刻参与社会实践,这是新世纪中国寻找自己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傅逸尘注意到,当下的一些文艺作品过分强调和依赖个人性,集体英雄主义精神、美学和叙事方法被逐渐疏离和抛弃。写作者应该更加重视追求崇高、不惧牺牲、敬爱职责使命的英雄主义。季亚娅说,写作者在寻找当下时代的英雄形象时,应该抓住时代表征,关注身边的小人物,除“悲剧英雄”外,文学也可以描写“喜剧英雄”。

不少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也引起了与会者关注。贺绍俊以《装台》《武汉之恋》等为例谈到,作家要在平庸情绪主导的社会中坚持理想主义,要有与时代匹配的英雄观,有强大的英雄情怀,有让自己成为“文人英雄”,才能塑造出英雄形象。从治辰分析了《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等人物的形象塑造,肯定了林道静作为一个不够完美的英雄人物的成长可能性,表示文学应该靠形象、感情和热情而非概念来赢得读者。徐刚以电视剧《山海情》中的主要人物为分析对象提出,对当代英雄人物的塑造不应陷入刻板化,既要写“大觉悟”,也要写“小心思”,这样才能让英雄人物更接地气。

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朱羽、程场,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崔荣、赵坤、李静、汪雨萌、路杨、沈闪等参加研讨会。(王冕 罗建森)

精神。叶留阳、张占亭的纪实作品《兰考长歌:焦裕禄及其战友们的无愧人生》围绕焦裕禄及其战友造福兰考百姓的伟业,诠释了干群同心、艰苦创业、舍身忘家、英勇奋斗的精神。此外,由数十位优秀报告文学作家创作的《红色引擎——来自上海市国资委系统红旗党组织的报告》也值得关注。该书记录了40家上海国有企业“红旗党组织”的故事,展现了国有企业中党的建设的成就,奏响了一曲气势磅礴的多声部红色交响乐。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6月10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百年巨变——雕塑作品展”在国博正式对公众展出。此次展览分为“苦难岁月”和“美好生活”两部分,展出以刘开渠、滑田友等为代表的一代代雕塑家创作的反映普通群众生活场景和切身感受的近百件雕塑作品,系统展示了近百年来写实主义雕塑对劳动人民的塑造。这些作品细致刻画回中国人民苦难深重、饱受欺凌的悲惨命运,生动描绘新时代社会全面进步、人民共享小康的幸福生活,深刻揭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使中华民族走上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为反映新时代人民的幸福生活,国家博物馆还与四川美术学院合作,特别为展览创作了七组大型系列主题性雕塑。展览在展陈形式语言、色彩和空间布局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设计,未来还将借助AR增强现实等新技术,邀请观众体验智慧化看展。(欣 闻)

(上接第1版《鲁院第三十九届高研班结业》)

阿微木依罗、陈宝全、曹洲洲等学员代表在结业典礼上先后发言,回顾分享了各自的学习收获,畅谈了参加本届高研班的心得体会,表达了对鲁院的感激和不舍之情。学员们表示,在鲁院期间,大家汲取了来自不同门类的营养,学到了创作知识,收获了彼此之间的深厚友谊,体验了多维度的文学生活,文学观念和写作视野得到大幅度提升拓展。今后将继续秉承鲁院高研班的优良传统,始终心怀感恩,永葆文学初心,坚守文学良知,不断充实自己,在文学创作上不断耕耘,努力在未来的文学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实、更加有力。

据介绍,为了办好本届高研班,鲁迅文学院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合理安排教学和管理各项工作。在课程设置上,政治理论课、党史和国情课、文学课、大文化课等科学搭配,统筹安排。30次专家讲座、10余次分组讨论、5次文学名家对话课、4次理论研讨和作品研讨课,为学员们搭建起关于思想、文学、艺术的广阔交流空间。本届高研班延聘全国知名文学刊物的主编、副主编担任学员辅导老师,在课程学习之外对学员进行一对一辅导。学员们还参加了中国作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朗诵会、中法文学论坛、中巴文学论坛以及“《著作权法》修改及实践”等主题讲座,赴陶然亭公园祭扫烈士墓,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展览,举办了师生趣味运动会和联欢会。3个月里,学员们以涵养精神品格、提升文学修养、丰富创作经验为目标,在紧张而高效的学习过程中与文学朝夕相处,表现出良好的学习状态,度过了人生中一段难忘的时光。“鲁三九”也以独特的精神风貌成为鲁院高研班大集体里的一员。很多学员充分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沉下心来创作和打磨自己的作品,而且已经有不少发表于各类刊物,为今后的文学创作积蓄了充足力量。

结业典礼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主持。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邢春、李东华等出席结业典礼。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重读《野火春风斗古城》

□吕思钰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李英儒创作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所呈现的就是燎原大势形成过程的一角缩影。小说发表于1958年,是李英儒根据1942年前后在保定地区与敌伪斗争的亲身经历创作的。据作家创作谈《关于〈野火春风斗古城〉的话》,经过日寇1941年、1942年的“扫荡清剿”,“晋察冀根据地的活动回旋地区同其他敌后根据地一样,相对地缩小了。为了度过艰苦阶段,为了迎接新的胜利,党号召敌后的敌后进步;在大量组织武工队的同时,派遣一批干部到平、津、保、石等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搞地下工作。”李英儒在这一紧急任务中被派往平津线开展保定地区的工作,他经历过内线工作的惊心动魄、紧张离奇,《野火春风斗古城》就是他对那段令人念念不忘的生活和斗争经历的深情回望。作品以此为创作背景,许多人物都有现实生活原型,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有着张弛,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小说以杨晓冬领导省城地下工作的行动线索为主线,令人印象深刻之处不仅仅在于塑造了一群英勇果敢的英雄人物和惊心动魄的斗争活动,更清晰深刻地展现出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群众路线是如何取得伟大胜利的。在敌我力量差距悬殊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在保持组织内部纯洁性和个人理想信仰崇高性的同时,一面依靠党的领导在组织内部严密计划,以英勇和智慧正面打击、伺机瓦解敌人;一面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群众支持和拥护,最终唤醒“有良心”“有道德”的中国人,实现分化、瓦解敌人的目的,取得革命的阶段性胜利。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李英儒着重刻画敌我正面斗争、党的群众路线以及党组织内部的建设这三个引领中国革命胜利的关键要素。

内线工作队员与敌人的交锋是作品最主要也是最惊险紧张的部分。作品正面描写英雄人物、反面映射政府官员的丑恶嘴脸,两者互为镜像,完成“刀尖上跳舞”的呈现。除了宴乐园散发宣传品、组织“反抢粮”、劫狱营救战友三个主要场景外,作品还设计了智斗蓝毛、夜袭龟山、单刀赴会伪省长、策反耿敬陶等重要情节穿插,紧凑细密,但有张有弛、高潮迭起。

“智斗”是内线工作的总体策略,在关键时刻,杨晓冬出面与敌人周旋,凭借过人的胆识,套取有效信息与敌人打心理战,成功唬骗敌人,解除危险;“反抢粮”运动中,他们在后方出力,劫持伪商会会长,迫使他遣散粮商组合、不派车队、破坏伪治安队的计划,为前线群众和战友争取宝贵的撤退时间。

“政治攻势”是内线工作对敌的另一策略,是从思想上、心理上突破敌人防线,通过政策渗透、思想洗刷、灵魂净化达到争取、策反的目的。工作队员借伪官员春节聚会宴乐园的机会,以递送贺片的方式散发共产党宣传品,引起敌人组织内部的恐慌;杨晓冬单刀独赴伪省长私邸,就战争形势、民族意识与伪省长唇枪舌剑,展开逻辑思辨的争锋,“人总不能把耻辱当荣誉。一个在民族敌人脚下屈膝低头、在祖国面前有罪的人,还有什么可卖弄的呢?”他把握住敌人心理,情理结合直戳其要害。

全景展开敌我双方的冲突时,李英儒总是有意荡开一笔,插入伪政府内部的“百丑图”。喜迎新年的宴乐园活动上细致展开伪官的心理描写,层层揭示伪政府内部的以权谋私、互相算计、各自自利、层层剥削,以至暴露其内部的昏暗与支离。当宣传品上跃现出共产党精神宣言和沉痛的声讨:“出卖祖国、出卖灵魂的人,心地卑微,人格下贱,生存是屈辱,享受也是卑微的,而且任何金钱物质上的所谓享受,也填不满上述损失于万一”,两种迥异的价值理想强烈冲突,由此刻绘出内线工作队员的基本轮廓,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整体精神风貌和坚定的理想信念也呼之欲出。

风雨百年,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李英儒清晰展现了共产党人是如何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获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而群众又在助力革命中发挥了何种无可替代的作用。

内线工作队员基本上都出身穷苦农家,对农民生活的苦难痛楚有切身体验,长期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杨晓冬和母亲相依为命地度过了零丁孤苦的童年,对以母亲为代表的农村劳动者有深厚感情,在集市上与小商贩亲切攀谈,获得卖枣老太的热情帮助,“同理发的交谈不久,关系搞得亲如家人”,皆来源于他的农民立场和群众意识。作为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共产党战士,他相信“不管多大的困难,不管多复杂的情况,只有亲临现场,站到群众身边,摸清底细,办法多得得很,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金环在战争中丧失父母,她将伤痛化为革命热情,在八里庄认下了没儿没女的老干娘,唤醒其阶级觉悟;她说服了伪司令部被鬼子飞机炸死妻子和独生女的老伙夫,要为救命人报恩,为自己的骨肉报仇;她认有向善之心的伪军汤二狗为干儿子,给予他安慰和爱抚,成功策反。银环为了解决周伯伯、韩燕来的生活困难,在冬天当掉自己遮寒的毛外衣,以单衣单褂过冬……”

人民群众受到工作队员的帮助和感召,反过来协助他们工作的不在少数。周伯伯连夜为越狱成功的杨晓冬挖藏身地道,不惜卖血换钱阻止他们回根据地,在他看来,“千万不能叫他们走,有他们在一天,咱们就有个主心骨儿,缺了这些人,天上就没有日头,在世界上就没有活头啦!”共产党人是人民群众眼中的未来希望,也是他们能咬牙面对苦难生活的精神寄托。韩燕来逃亡途中毅然放下日本入侵者的薄小曼曼母,之后为内线工作传递重要情报作出贡献……“人民用鲜血养育着我们,拿生命捍卫我们”,党与群众的水乳交融至深,这是走群众路线受到人民拥护的结果,也是必须要坚持走群众路线的理由。

正如韩燕来所总结,“领导上一举一动都是为国家为穷人,帮助他们就等于帮助自己。”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真正做到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他们心中有大爱,怀着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时代的责任感,为了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幸福而奋斗。当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被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所感知,获得热爱和拥护便不足为奇。内线工作队员从最初的“弱者”、少数,发展为凝结了成千上万人民群众的庞大力量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的胜利就已初现燎原之势。

杨晓冬为代表的内线性工作队员在与敌伪交锋的行动中,始终坚守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严格执行组织纪律,同时建立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打造了一支果敢严谨、团结友爱的优秀队伍。组织队伍内部的建设,是“尖刀”始终锐利精准、直捣敌人心脏的保障。

在与敌伪斗争的过程中,工作队员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坚如磐石,甚至超乎个人生死。杨晓冬被捕入狱命运未卜之时,所考虑的首先是革命工作问题,“你倒下了,还有燕来他们。再说,党会派更好的同志来领导工作,怎能谈到输光呢?”其次,是关于个人革命理想及价值实现问题,“一个共产党员,只要扪心自问,他的一生,对得起人民,对得起自己的阶级,对得起自己的党就行了……”生死攸关之际仍全心记住党的任务和共产主义理想,这是何等一往情深而超拔的信仰。

金环被捕后遭受严刑拷问,她在绝笔信中回忆对党的感情感人至深。“我不会给养活我长大的阶级,教育我成人的党,帮助并热爱我的同志们丢人”,“我既非红颜,也不信命,我就知道相信党”,她丝毫不为敌人抛出的金钱荣华所动,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都在进行对敌人的打击,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内线工作队员的自觉,在保持个人思想纯洁性的同时,他们也有效保证工作的先进性,韩燕来进入革命根据地后对新环境充满喜悦和欢乐,对即将加入党组织满是憧憬与追求,但在看到杨晓冬研读党的最新文件时心生愧疚,不由得自省“人家把脑袋埋到书本里,你的心思飞到云端里,羞不羞?”就成熟的共产党员杨晓冬来说,他收到领导来信后对内线工作深入反省,“党和上级对咱们是多么关心,多么信赖,又抱了多么大的希望呀!咱们这些党员,给党做了些什么呢?我个人首先应该从思想上行动上检查。”肖部长在给银环的密信中有营救杨晓冬的工作指示,还有全面深刻的反思,不仅指出银环工作上存在小资产阶级温情、政治上麻痹大意,警醒她“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嗅觉任何时候都要尖锐灵敏”,同时还反省自身在高自辩变问题上的责任。党组织内部从不推诿,从不埋怨指责,他们善于总结斗争中的各种经验,提升个人思想认识,推进党组织的建设,时刻保持个人和集体的先进性,这是革命胜利的有力保障。

回到《野火春风斗古城》颇具象征意义的题名,李英儒“以野火喻作敌人的凶焰,以春风比作党的力量,任你敌人的凶焰再高,烧不尽中国人民革命的有生力量”。以杨晓冬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战士用英勇的斗争宣言,纵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敌我力量差距悬殊、处境艰难,但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真理和正义,以人民群众为永恒坚固的基石,“春风”与“野火”的对抗交锋终会迎来“弱者”的胜利,正如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